

知青岁月
文革博物馆专集（十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增刊 第一一二期 ——
(一九九七年二月廿五出版)

1.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蔡 平
2.插队傣家寨	赵之荣
3.黑龙江边的一段回忆	胡东放
4.被亵渎的青春——大陆上山下乡女知青惨遭蹂躏录	巴 山

C N D 邮址: CND, P. O. Box 10111, Gaithersburg, MD
20898-0111, U. S. A.

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
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谢谢！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请勿在营利性出版物上转载。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蔡 平 ·

第一次见面，在宜川县医院宿舍院。王春英很冷漠，让我坐下，自己却站着，好像随时等我出去。她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说吧，还谈什么？该说的早说过了。别再采访我，我都烦了。你们出书上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还在这儿呆着？”

传说中的黄河船工二缠子——周延才，站在她身后，中山装敞着怀，花白的平头，一手叉在腰里，很男子气。

“去吧，去吧，”他说，“跟北京老乡聊聊，人家老远来的。”

王春英没再说什么，就顺从地跟我走了。

在县招待所，她低着头说：“我吃亏就在太善良。那时太苦，谁对我好，就跟谁了，没想以后，更没想怎么带他这几个孩子。现在我就想回去，实在办不回去，退休也要回北京去！”

“当初不是他救了你？”我问。

“瞎扯！哪有这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她扬起头，非常生气。

王春英的父亲曾是我国一个大水电站的党委书记，父母很早就参加革命，她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里有保姆。现在父亲有病也是住北京的高干病房。

王春英的儿子已经转回北京，她最担心的是她这个上高中的女儿。“不能让她像我一样，她应该在北京上大学。在这儿，没前途，没发展。”

我提出去她原来插队的村里看看，她不想去。

“三娃家里穷，脏得很，还会有虱子，你不怕？”

经再三恳求，她勉强答应，一再叮嘱：“咱们可说好，我不在那住。要住，你自己住！”

在新市河地段卫生院，王春英要求停车。她拉我到路边。

“你看，这儿我也呆过。那时我们吃完饭就坐在这儿，看路上的汽车。脚下的云岩河能一直流到黄河去，水可清，可凉，夜里睡觉，能听见它哗哗的声音。”“你看这石桌，中午在上面睡觉，凉凉的，可舒服。”“你看那边，当初我家掌柜的在那接的我，他牵着小毛驴，驴背上驮着我们的箱子。”说着她脸上有了笑意。

耀眼的阳光下，王春英好像换了一个人。

“28年了，你说话怎么还是北京口音？”我问。

“没变吗？”她乐了，“一回北京，我妈老嫌我说话土。我只好扳着点，不过也老忘。”

果然，在阁楼乡，一碰上满身是土的乡亲，她又是陕北腔儿了。人们都跟王春英打招呼，让她到家里去坐，她也动不动就掀帘进去。

“那时我家有电视，别人都来看。土哈哈的农民，还带着孩子，进屋就脱鞋上床，有时孩子就尿在屋里地上。我给他们倒水，准备吃的，我们关系都可好，没有什么‘北京人’，也没有谁看不起谁。要是在北京，能有这感情？”说着她白了我一眼。

北京17年，陕北28年，王春英的心，究竟离哪边近呢？

王春英呆过的依锦村，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山村，至今没有通电，每周定期放水，5毛钱一汽油桶。农民有买不起的，就赶着瘦弱的小毛驴，走几里山路驮水。

王春英领我走进一扇破门，“这是三娃家，我原来就住在这儿。”

窑洞很深，空空荡荡，只有5米长的炕上，擦着黑乎乎被子，地上一个破柜和几口盛水的大缸。

一进窑洞，王春英长舒了一口气：“可到家了。”说着一蹦腿上炕。她把路上买的馒头拿出来和儿媳商量晚饭吃什么。

儿媳望着婆婆怯生生地说：“家里除了面，啥也没有了。”

王春英四处看看，“这是我老同学，不挑什么，就弄点山芋，再做上点面吧。”

王春英带我去村民刘堂家。走在村里的小路上，王春英拖着两腿，低着头，说话再没有一点底气。

“你累了？”我问。

“不是累，”她叹口气，“我是不想走这路。一走，好像又回来了，又是这儿的人了，过去的事像放电影一样。真的，不是我不想回来。我不能跟几个娃在一起，看到他们，我就发愁，心里就难过。你说，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哪？”

就在这里，王春英生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怀儿子时，她怕人看出来，就用带子把肚子勒紧。生产时，她躺在炕上，任接生婆的脏手胡乱动作。她连哭带叫，头往墙上直撞。

第二个是女儿，她自己接生。那时没有酒精，她就用白酒把剪子擦干净，自己忍着疼把女儿生了下来。

她不愿在人前流泪。当初所有的人都劝过她，连要好的同学也不赞成她和当地农民结婚，认为她给北京人丢脸。

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回北京了。她站在窑洞前远远望着，走一个哭一场。路是她自己选的，她说她认了。

☆ 黄河边的爱

在县城，我问王春英：“你当初爱周延才吗？”

“那叫爱呀？公社五花大绑把他绑走了，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候，这个罪名要判十几年刑！我去找人，公社说，你们办结婚证就没事了！我说，那就办吧。他婆姨死了以后，我老去他家帮忙，弄得人家都以为有什么事，我不想连累别人。”

在黄河边，她的感觉不一样了。王春英指着黄河大声说：“你看，我家掌柜的

原来就在这儿扳船，我常从那儿下水，游到河面上岸。他船扳得可好，水性也好，每天能挣10分，是最高的！”口气像在谈一个英雄。“他人长得精神，一站船上，可帅气。他在前面扳船，我就跟在后面游。他那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周延才说：“有些人对这事太不理解，说是我救了王春英她才嫁给我，其实哪有这事？她和同学在黄河游泳，是挺危险的，不过我没救过她。她水性比别人都好，从小在北京就游，还用我救？

“那是1971年的农历六月十八，天黑太太（特别黑），我被绑到公社……”

那天半夜，王春英风风火火走了几十里山路，也追到公社。

第二天，公社干部规定，不许王春英跟周延才随便接触。聪明的王春英写了个纸条，藏在馒头下面，众目睽睽之下，她满院子找周延才，见到就大声喊：“二缠子，还没吃饭呀？”说着，馒头又悄悄交到周延才手里。纸条上，她把公社干部怎么问的，她又是怎么回答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了周延才。

周延才踏实了。但是，当周延才看到王春英背着挎包回村时，又突然胆战心惊起来，他怕村里知青给王春英做工作，怕王春英在另一个村插队的弟弟说姐姐，怕她反悔。

“只要王春英一反悔，我就完了。不判刑才怪呢！我当时，唉呀！那个心情，怕死了，就好像有人拿杯茶，泼到我脸上，眼泪一下流出来。”

他赶快向别人要了一张麻纸，给王春英写信。写他们相爱的过程，写现在的难处。在落款处，他写上——“难中的二缠子”。

王春英看着周延才的信，眼泪滴到纸上。想都没想，又跟着捎信的人回到公社。

王春英找书记，找公社干部。没过多长时间，司法员就把周延才叫过去：“二缠子，谈恋爱什么人也挡不住，你的缺点是谈得太晚。”就这样，他们总算一块儿离开了公社。

路上，周延才对王春英说：“春英，我跟你说个事，我在公社这3天，风声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了，一路这几个小时，每过一个村，咱俩走近点。”

那时正是上午，每过一个村，就能碰上许多地里干活的人，看到他俩肩并肩地走，都招呼一声：“二缠子，回来啦！”周延才就高兴地喊：“回来啦！”

回村的那天晚上，村里正好放电影。周延才浑身上下洗了个遍，换了一件还没上过身的白背心，拉上王春英往300瓦的大灯泡底下一站，村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俩。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春英的弟弟来了。

周延才被抓到公社的事，王春英的父母知道了，他们马上叫她弟弟回陕北，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把春英叫回来。只要一回北京，事情就好办了。

那天中午，周延才正在做饭，面都揉好了，王春英在坡上叫他：“二缠子，我跟你告别来了，我回北京了。”

“春英，你这一走，可能咱俩就永远见不着面了。”

“你放心，我一个星期写一封信来，一直坚持下去。”

“春英，你这一走，再也不要给我写一个字，过三年五年，我就把你忘了。你要写字，我就难受了。”

就这样，王春英坐着不动，周延才也不动。他们呆一会儿，说一两句话；再呆一会儿，再说一两句。“她哭，我也哭。那眼泪呀，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多。”

最后，这一对恋人，哭作一团，紧紧抱在一起。

王春英没有走。

☆ 北京：无话可说

山峦之间，那条世界著名的黄河，在我们脚下，浊浪翻滚，轰然作响。当年，王春英和周延才就是从这里下水，背着孩子，游过黄河的。他们回北京去见父母。

为省路费，他们先游到黄河对面，再走几十里山路，在山西的临汾上火车。孩子在父亲背上，让水呛得直哭。周延才边游边说：“回去以后，要是你妈看不起我，我就走！”

他们千辛万苦回到北京，没呆几天就回来了。

“家里虽然烧了好多菜，就是没话。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有，那滋味，真够难受的。”

为了让女儿回来，家里电报打过——“父病危速归”，女儿没有回来。儿子人都去了，女儿还是没有回来。当初女儿结婚，公社没有家长的信，不给开结婚证，但家里在万般无奈下，还是写了。

周延才说：“给她家里那信，是我和王春英商量着写。大概意思是，爸爸妈妈，我大了，我理解父母对儿女的心情，但我喜欢黄土高原，更喜欢这个人。后面还说了许多气话。

“结果这一气之下，她爸真把信写来了。信是用毛笔写的，写给公社书记，大概意思是，我的孩子王春英在你处插队落户，孩子来信说，她要 and 周延才结婚，请公社考虑。如没有什么问题，孩子大了，家里就听组织的。孩子的事由孩子自己决定。另外，他们还给王春英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疼爱儿女的，我们写信让你回来，你不回来。你的终身大事，怎么也该回来和家里商量一下，当父母的连知道一下都不应该吗？你的事情，就由你自己做主吧。”

如今，死活留住女儿的人就坐在面前，还说什么呢？

王春英的母亲来信，从来不提周延才。王春英的弟弟妹妹，也从不叫姐夫。王春英的弟弟说，如果我再进你家门，就倒着走路。即便他回到宜川，也决不来看姐姐。

王春英现在给家里写信，不知道写什么，没话说。父母有什么事都是儿子转告她。父母在北京住着一套三居室。王春英的儿子回北京了，却不在姥姥、姥爷那儿住，而是自己每月花200元，在外面租房子。

王春英说：“我有时心里特别扭。结婚这么多年，儿子都这么大了，他们怎么还转不过弯来？儿子懂事。他跟我说，‘妈，以后你回来，就住我这儿吧。’”说到这里，她伤心极了。

“每次回去，开始两三天还行，三四天以后，家里人脸色就不好看了。楼上楼下的，看我们也老像是外人，只好呆几天就回来。”

王春英说着突然转头看我，“其实，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苦恼，陕北人有陕北人的欢乐，谁也代替不了谁！”

☆ 陕北：去留两茫茫

“你回北京，你家掌柜的愿意么？”我问王春英。

“他说我先和小女子回去，他退休再回去。他现在在医院烧水，到北京，他可以给人烧锅炉看大门。”

“王春英如回北京，我决不拦着。”周延才肯定地说。“你知道，我们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我们流了多少眼泪哪！说实在的，我这一大家子，孩子都算上，王春英占第一位。我会永远对她好。

“她回北京这事，我考虑过，在宜川，人都尊重你，可到了北京，你算个啥？谁把你往眼里瞧？她老说那里有儿子。可到时儿子结婚了，你又挣不着钱，还得看儿媳妇的脸。如果有正式工作就会有退休金，我们自己就能生活下去，管他看得起看不起！”

“所以，我的意见是，第一，她回北京，只有户口，没有工作，我不同意！有户口还有工作，我这边退了休就过去。第二，我们回去没有房子恐怕也过不下去，自己租房子或买房子哪负担得起？第三，孩子的上学问题，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周延才的口气不容置疑。听下来，他的这些条件真不易实现。

晚上，王春英找来几个在当地结婚的北京知青和我见面。招待所对面的小饭馆里，我买了几听饮料、几袋瓜子招待他们。

临分手，我送他们出来。其中一个，又悄悄返回小饭馆，她用塑料袋把桌上吃剩的瓜子收起来。见我看她，有些不好意思：“还不少呢，带回去，给娃吃。”

回到招待所，我向同室的一位延安女干部讲起这些。她冷静地笑了：“你别同情他们。这些人，到现在这一步，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个人原因。你不信？别说在北京，就是在延安，他们也混不好。他们老躺在北京人身份上睡觉哪成？心理永远不会平衡！人嘛，到哪说哪，北京人怎么了？当初全国人都在受难，北京人就不该受？现在，全国人都搞改革，你北京人就该吃大锅饭？当然，王春英例外。”

在我之前，北京来的人，曾经大包大揽，答应帮王春英的忙，把她调回去，但最终她失望了。这次她也问我，你能不能帮忙？我回答说：“够呛。”

□ 老胡摘自《中国青年报》1995年5月19日

~~~~~  
插队傣家寨

• 赵之荣 •

我插队在云南，刚去时，被安排在边疆傣族村寨中一户贫农家暂住几个月。他家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儿子是副社长，管理全村的生安排，称得上是村里的红人。

儿子虽然结了婚，可按傣家风俗，仍跟父母同住一个院子，同吃一锅饭，饭桌上却是等级分明。老爷爷坐堂屋正中，四岁的长孙坐左边，其次才是儿子和奶奶。我这个来接受“再教育”的女知青，却被安置在老爷爷的右边接受全家女主人的服侍。尽管工作组的汉人多次交待过，知识青年是来请他们改造的，换言之，可供差使；可政治宣传哪能敌过古老善良的傣家人朴实与宽厚的好客心。我们语言基本不通，饭桌上优惠便是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

使我感到良心不安的是：这家媳妇从来不能上桌跟大伙一块儿吃饭，只能等在厨房，吃残汤剩饭。尽管我多次用我那半不拉的“傣话”强烈呼求：“大家一吸吸哦”（“大家一齐吃嘛”），他们的反应尤其使我失望：我家媳妇惊慌失措地避开了我，其余人等却泰然地回答：“你吸，你吸，勿管她。”（“你吃，你吃，不管她”）。她也出身贫农，当时的阶级地位决不亚于夫家，本该平起平坐，可传统势力在一个遥远的山寨却是占绝对优势的，媳妇的地位几乎为零，她们的存在只在于创造，不在于分享。连她们也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我自分配到她家后，只见她起早贪黑，拚命干活，农活、家务、带孩子……，却从来没听见她大声讲过一句话，直到她一语惊人的那天。

傍晚收工回来，正想躺到床上舒展一下疲惫不堪的筋骨，村里小道上有人在锣声中嚷嚷着：“今晚开批斗会，缺席的要扣工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对批斗会早已不感兴趣，但说到要扣工分，可有些紧张。初干农活，体力不行，本来挣的工分就少，再一扣，年底分到的粮食还够填肚子吗？再过几个星期，所有的知青都要搬到知青房去独立生活了。批斗会是例行公事，无非跟着喊喊口号罢了。

不知怎的，那天晚上可有些阴风惨惨的，风刮得紧，天黑得早，连门口的惯常嘻闹的儿童也不见了，四周静得有些异样。平时开会我们这班子知青老拿老社长开玩笑，见面就叫他“贫下中农当奶”。那是社长的口头禅，傣语即：“贫下中农同志们”。平时他只是笑呵呵地回答：“我汉语赶（讲）得不好。”傣族村民不识钟表，只看日、月来定时，却总在会场上放一架闹钟，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肯定是从区里会场抄来的作法。总会有哪个捣蛋知青乘乱把闹钟提前转到九点，钟一响就起哄：“九点罗，散会罗。”两个钟头的会总是被迫在一个钟头后散去，老社长也只不过摆出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要调教这班知青，可不容易。

可那天晚上，邻村的人都来了，整个谷场挤得满满的，社长身旁坐着几个乡里来的干部模样的人，再加上他那一付冷若冰霜的表情，谁也不敢造次了。

叽叽呱呱一通傣话报告之后，一个五花大绑着的富农老头被拽上台去了，一阵口号过去之后，这老头就被几个五大三粗的民兵吊到台侧的横梁上去了，雨点般棍棒落在那个始终没有机会辩护的“被告”身上，他那努力压抑着的惨叫足以令人晕绝，一直打到他口吐白沫，几个慌了手脚的民兵把他扔在地上，找凉水去了。

大家都惊呆了，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瘸子姑娘，扑在那弥留的生命上，嚎啕

大哭起来，边哭边叫：“阿爹，阿爹……”，任何一个人走近，她都用身子挡住她爹，一付“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悲壮表情。绝望的小兔子也有叫老虎发抖的时候，果然没有人再敢碰她爹了。

我回头一看，几个妇女用头巾掩面抽泣起来，其中竟有我家的媳妇。那年头，这可是犯大忌的。“没有阶级立场”，她的丈夫可能被撤职，失去乡里的宠信，重则会挨斗，然而她却当众流下了对“阶级敌人”同情的泪。

那瘸腿姑娘扑在老头身上，死活不肯放手，大冷天一任一桶桶的凉水把她和老头浇个透湿，老头命大，终于又活过来了。

次日清晨，我起得比平时早，我正拿着漱口缸到侧屋的厨房去漱口，叮叮当当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我楞住了，那个瘸子姑娘和我家媳妇站在竹门背后，我家媳妇正往她怀里塞一包药样的东西和几个正冒着热气的糯米粑粑。小瘸子带着一付惊恐和欠疚的目光，竟吓得抖起来了。她昨晚既然有勇气去保护父亲，当然不怕人看见，而现在她显然是在为别人发抖了，她可能见我从正屋出来，忙着往门后躲，慌忙中把挂在门后的锄头给弄倒了。我毕竟是一个外乡人啊，那年头，连邻居都不敢信任，谁敢担保一个外乡人不会去告发她们。我一时间也吓傻了，要退回去，又怕更吓坏她们，要解释呢，又不懂俚话。

“勿骇，勿骇”（“不怕，不怕”），我家媳妇大声地、从容不迫地安慰着小瘸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小瘸子飞快地拐出大门，消失在墙角。我家媳妇头也不回，毫无惧色地跟着她出去了。这时候的她，跟那个饭桌都不敢上、沉默得像一只小老鼠一样的妇女判若两人，在阶级斗争的腥风恶浪中，朴素的人性更显其耀眼的光芒。

事后听说那晚批斗的原由，是因为县上斗大地主——土司，乡上也得配合搞点斗争，但找了好几个村，好不容易找到我们村的这个富农老头，利用农闲偷偷跑过边境到缅甸做了一趟小生意。当时跑这种小生意的人有的是，但出身都还可以，富农胆敢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吗？需来个杀鸡儆猴，老头正好当了靶子。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十年后，那一片地区因为边境贸易发达而成了重镇，绝大多数人都弃农经商了。那老头还算是这条商业之路上的拓荒者之一呢。

□ 摘自《新闻自由导报》2009期

~~~~~

黑龙江边的一段回忆

• 胡东放 •

文革在人生的尺度上似乎已成遥远的历史，但它在历史的尺度上却还像是一个未能与现实剪断脐带的怪胎。近来读了一些回忆那段时期的文章，不由得也触发了我彼时在黑龙江边的一段可惊、可叹、可悲，而在某种意义上又十分可笑的难忘经历。

我是在哈尔滨这座苏俄遗风甚浓的城市里长大的，经常能从俄罗斯的远东风景油画中见到弥漫着那种特殊沉郁气氛的黑龙江。随着文革初那股铺天盖地的知青大潮，我选中嘉荫生产建设兵团，只因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正居于中苏边境的这条神奇的界河之上。

一九六八年初冬，经过几天的火车、卡车、胶轮马车的颠簸，我们终于在一个

飘着轻雪的上午到了叫做“高升”的村庄。记得当初进村时的那股纯真的激动好生强烈，看到沿路三三两两的孩子，我们有人招手、呼喊，有人扔糖块。但奇怪的是：那些孩子一言不发，眼里却似藏有一种敌意和恐惧，这可与我们从照片、报刊和宣传画里看到那些“笑佛”般的贫下中农大不一样。经过村口的麦地时，突然看到一队农民模样的人被知青押解着走过，其中一个知青大声呵斥着一个走路时微微出列的人，并警示性地挥动着手中的树条，这些人走路时头垂得很低。此时我们才感到这里的情形并不寻常。

待我们怀着疑惑刚把行李放妥，便听到敲钟开饭。尽管当时很饿，但连里的指导员却要召集新知青讲解政治形势，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是比吃饭紧要千百倍的头等大事。他关于阶级分析的讲话令我们每个新来的人都深感震惊：他谈到这村庄虽小，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却空前复杂激烈，远非内地所有其他地方可比。苏军的直升飞机和装甲车日夜在对岸巡逻，而我方的军队则部署在后面数里外的山上，所以这个小村的角色绝对像是棋盘界河上的第一线兵卒。而村中虽然有一千多人口，但这些人中地、富、反、坏、苏修特务和脑袋上顶着一大堆问号的可疑份子，及“破鞋、烂袜子”占绝大多数。总之拔不出几个好人和可信者。基于这种情形，二百来知青在这里的首要任务就是观察监视对岸苏修大鼻子的动向；监督看管内部的这些“阶级敌人”，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红色边疆革命大业的阴谋得逞；此外就是参加生产劳动。他讲这番话时的表情是庄重严肃的，当时大多数新知青都为能跻身于如此不寻常的革命事业而内心震撼，更被他代表组织把我们全划归革命营垒的信任所感染（我父母均因走资派的罪名被炮轰打倒，而我则被勒令不准上学校或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

当天夜里的感受确实是惊愕复杂的：亿万本小红书上都印着那些永远只和革命正义联接在一起的“农民群众”和“大多数”，在这里竟变成了地富反坏特（务）的营垒，而革命的一边则是为数不多的转业兵和我们这些知青。后来才知道，在整个隶属二师的嘉荫独立团的二十个农场中，只有我们“高升”在阶级分析的数量上是“敌众我寡”的，而其它的连队则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乡民，数量远在知青之下。我在黑龙江边的插队生活就在这种十分罕见的格局中展开的。

我和一些人被分到警卫排，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江岸和村内外巡逻，保卫祖国红色边疆，对付国际国内两大敌人。当时中苏边境正处于岌岌可危之时。那段日子里，白天常常看到苏方的直升飞机沿江飞巡，而晚间则是苏军打着强烈聚光灯的装甲巡逻车沿着对岸的江堤作有规律的运动。相比之下，我们背着的则是几支平日里从不装子弹的旧枪，或是扛着插有铁矛的棍子，唯一不同的或许是个个口袋里的战无不胜的小红书。记得当时背着这些陈枪旧棒，内心也不免生出恐惧：如果大鼻子过来，凭这几个演出道具和那塑料敷面的小红东西能顶得住？这不有点像当年洋枪队前自欺欺人的义和团么？可这内心的恐惧一旦在雷打不动的学习会上诉诸舌端，就全清一色地变成“苏修纸老虎”一类的豪言壮语。

在这里进入对于内部的阶级敌人的专政的角色开始是很不习惯的，无论是文弱书生还是腼腆少女，和那些在全国农村其他地方理当对我们施于“再教育”的村民们说话，都要硬做出一派毫不容情的凶狠状。大多村民在这里白天被人领着在地里干活或没完没了地学文件。问题严重的那些则在夜晚被关在几间由马厩改装的一个个小监号里反省。这些监号面积很小，只够一个人坐下或蜷腿躺下。要上厕所则必须高声报告，再由人押着去。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站夜岗，两人一班，沿着固定的路线在村里走动。当时还没有电灯。但七、八点钟后几乎没有一家人的煤油灯是亮的（知青宿舍除外）。村子里死一般的又暗又静。村道上也没有行人走动或邻里相互串门。开始对此颇感奇怪，尔后经人点拨才明白：原来晚上串门点灯是犯忌的。因为那样会被视同为秘密联络和发暗号。农村的那种颤颤悠悠的煤油灯光，再由人持着在屋内来回走动，从窗外看真像是在晃动发信号。确实有人已经为此被

严厉地审查和警告了。记得在那月光之下，看着自己孤零零的印在雪地上的影子，常常禁不住自问：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是接受再教育，可眼下的扮相不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还乡团国民党么？一个下午我由一个清瘦但眼珠乌亮的六十岁上下的老乡领着站白班，他姓谢，是连里有数的几个能受到信任的人。我们在经过礼堂时，里面黑压压坐满了学语录的村民。当时他对我说“满屯子挑不出一个好鳖”（原话）。只有他和他那红得发紫的侄子除外。以后我才知道他的侄子是何等的一个革命奇人。他被热烈地邀请去各处巡回演讲，而使他名闻遐迩的演讲内容则是当时红得烫手的题目：“怎样识别阶级敌人”。

几乎在半年之后的一次会上，我们才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位能发现阶级敌人的天才。他和那叔叔一样瘦，灵活的眼睛似乎总是在察言观色。他的讲话有一种歇斯底里的革命煽动力，他坚称第一眼就能从生人的面相特别是眼神里辨别出阶级敌人，并列举出他在火车站等许多场合从陌生人群中成功地指出阶级敌人甚至其成份的奇迹，他的讲话在一些幼稚的知青中激起热烈的好奇和轰动。许多人都对他通过相面发现阶级敌人的“特异功能”深表钦佩赞叹。

另外一个半受信任的人是任副排长的老乡，他训斥那些村民的凶颜厉色与见到知青那讨好般笑魇魇的样子真是判若两人。他的鼻炎很重，说话常带着一种擤鼻涕擤不出来的滑稽的共鸣。后来有一天，他也和被他关押的人一起被关进格子了。原来他利用那些“特务”们在押的机会，在晚间巡逻时去强行光顾他们的女人。据说他那擤鼻子怪声是他通知那些女人开门的独有的联络信号。他的罪名是给特务通风报信和玩女人。

后来因对情况日益多的了解，才品出这复杂的阶级斗争无非是导源于这条连接两国的界河。在中国人对苏联尊称“老大哥”的那些日子里，越过界河就像跨过邻居的篱笆那么悠然。打鱼、下网、种西瓜、联欢、婚娶、卖换山货，村民与对岸那丝丝缕缕缠结不清的过去，就演化为一度盖不住抹不掉的政治阴影。尤其可悲的是，在那处处闪着阶级斗争大眼睛的特殊时刻，此类交往只能被贴上当苏修特务这一种标签，结果便是这些可怜兮兮的农民们不得不戴上这顶被强加的帽子，而且还要为此既给自己更给别人编造无数虚构的事件和人物。在那一特殊时刻，给自己编罪是被动地解救自己的办法，而给别人编罪则更是主动地自救的上策。“深挖办公室”三天两头传出又挖出多少阶级敌人和苏特的赫赫战果。妻子检举丈夫，儿女揭发父母的怪事纷纷出现，邻里乡间的你长我短和磕磕碰碰都无不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结果，农民们的那种虚构文学的创造潜力得以空前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全村上下也都在这种相互攻击中成了坏蛋。这种揭发风气在知青中也小有波及。我因喜欢外国歌曲，下乡时曾带有一本“世界民歌二百首”，常常暗自一人翻看。有一天书突然失踪了，后来听说已被人交到指导员手里。虽然并没有因之引起太大的麻烦，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犹大竟是一铺大炕上睡在我身边的我比较要好朋友。这真是一个人人都患了揭发症的疯狂时代。

虽然天天站岗，但从来没有一次真正地碰到过发现过阶级敌人，只是有一件神秘的事至今没有被揭破，那就是夜晚在江边和村庄周围频频升起的信号弹，有时就是从你眼前的夜空直接升起。由于是太经常地只见信号弹不见人，后来大家通常认为是苏方打过来的某种定时信号弹，以便在双方的政治军事对峙中扰乱迷惑我方而已。还有一次连部不远的地方真的发生了爆炸。近处的知青也受了不小的惊吓，以为是什么突发事件，结果尔后才知道：原来上级为增进敌情观念和测试战时反应效率，特派一个参谋带着炸药准备清晨在江边引爆。可谁知该人因睡意过浓，醒来时预定时间已过，结果他惶于贻误军机，急匆匆没跑多远便燃爆了炸药，结果是弄得连部的玻璃都被震碎了。尽管那时十几分钟就可跨越国境，但几乎没出现过知青越境事件。大家只是在全团规模的巡回批斗会上见到过一个中等身材的沈阳青年，据说他手里握着一张与军事有关的地图，在初春黑龙江刚化冻之时越江投敌。（因为

这时没有雪迹，不能被作为证据通过外交途经索要）。他自诉和另一个人越境之后没被发现，一直走到一个市镇也无人理睬。待到他们饿极了才不得不向该镇苏方警察局自首。结果是他们被蒙上眼睛，用吉普车拉着转了几个小时，然后被审讯了一番，交上地图，吃了两片“带树叶的”黑面包，就根据中苏之间的边境协定被送回来了。在押送他的马车旁，我记得有人问他为什么投靠苏修，他回答说听说那里生活好。据说他后来被处决了。

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在江边的一个很热的夏日中午，我由于是夜班岗便和几个朋友到黑龙江游泳。当时一艘苏联运煤的自动驳船从上游开下来。由于主航道距我方江岸很近，当时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穿着桔红色救生衣的水手。当我们这边举着拳头高喊打倒苏修口号的时候，却看到他们两个人笑着向我们招手。这个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记得当时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为情。尽管两个国家在对峙，尽管苏联自身也是官僚式的教条主义政治的摇篮，但在那一风清日丽的特定情境下，那些苏联水手还是保留了人性中的那种突破了政治异化的个性美，与我们文革式的那种生硬的、全天候的阶级斗争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直至林彪事件出现之后这一反常格局才开始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还是借助于斗的方式完成的。新一派的现役兵和从南方杭州等地后进入兵团的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介入，以及随之衍生的南北知青在兵团的大规模武斗，加之极左受到一定冲击之后人人自危的氛围的适当缓解，都对结束黑龙江边的这幕“兵”与“知”的奇妙化合专了“农”的政的历史活剧起了相当作用。而后来最有戏剧性的结尾是：当所有地富反坏特一个个都从马厩里出来还其好人面目之后，倒是那个识别发现坏人的专家谢家叔侄被戴上了一顶坏份子的帽子（正像几年后四人帮的情形）。当然，“知青”无过，“兵”亦无过。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场革命战友的误会而已。

虽然那段奇异的经历已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但至今仍有许多清新之处值得回味。文革的疯狂不能说不荒唐，如果说单纯青少年的疯狂是真诚的话，则稍有阅历的那些人的荒唐则完全是（各怀其意）表演出来的了。文革最震惊历史之处，在于它竟能够调动一个世界最大民族的所有人都真真假假地扮演了一场辱没人性尊严的荒诞闹剧。那种惯以通过强权逼人就范来谋求自身幸福安乐的生存战略，在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向文明更高层面的进步中本应是被逐步减弱的（减弱的程度也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人文标尺），却在文革中以阶级斗争在社会各层次上的全面展开而得以病态的增强。这种完全与人类文明发展作反方向的反动正是文革最大的历史悲剧性之所在。从今天的历史向回看，后人们对前一代人常常发出的诘问是：如此的荒诞你们何以容忍它这般大摇大摆地在历史上存在？但后人只有在自己的经历中才能体会到其某种市俗性的真谛：历史是永恒的，它有的是时间去等待和匡正被瞬间颠倒的黑白美丑；生命却是有限的，所以绝大多数善良人的弱点是付不起以只属于自己的宝贵瞬间去换取全社会的永恒正义之代价。正因于此，邪恶者才敢于且能够为一己之利在瞬间以强权玩弄了历史，而善良的芸芸众生才拘于自保而违心地沉默、迁就甚至有时不得不附会，甚至帮衬了这种玩弄。尽管如此，我们应以自慰的是：这一历史的恶性循环机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及独特方式走向衰落，而文化大革命的瞬态轰动则无非是其衰落前的最后几点回光反照而已。

□ 摘自《新闻自由导报》2 1 4 期

~~~~~  
被亵渎的青春  
——大陆上山下乡女知青惨遭蹂躏录  
• 巴 山 •

◇ 被社会忘却了的故事

一个女知青麻木地推开生产队长家的门，一步一步、沉重万分地走了进去。

生产队长的桌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小盘花生米，还有一张招工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印。

女知青站住了，双目无神，象一个被送上祭台的羔羊。

生产队长甚至连门都不关，闪闪烁烁的油灯都不吹，就粗鲁地笑着，一把扯开女知青的衣衫，无耻地揉摸那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乳房，然后把她推倒在充满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

女知青没有喊叫，怕人听到，只是心和下体一同疼痛着。

当女知青从床上站起来，滞重地穿着衣服时，生产队长将血红的大印盖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样鲜红的还有床单上几块处女的血痕。

假如这仅仅是故事，是小说，那么，本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助理保卫干事，被一名当权者奸污后送到四川去上大学，后来此当权者又奸污其他女知青被揭发出来，坦白罪行时交代出与她有过关系。当外调人员到四川找到她询问情况时，她却矢口否认。外调人员失望而归，那当权者因此而被少判一年徒刑。

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

这些色狼罪有应得，遗憾的是大部份奸污过女知青的人并没有被揭露，他们到死都会为自己的艳福而洋洋得意。

最终倒霉的还是那些弱者，他们心灵的创伤不但终生难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个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赶出家门，因为她不是处女，她的处女贞操在插队时被公社党委书记给破坏了，她的丈夫并不因她当时若反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纵火犯而原谅她。当时她看麦场，无意中烧了一百多斤麦子。

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队时入了党的回城女知青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怀疑是被大队党委书记奸污后而发给党票的，因而，这些人连找对象都成了问题。

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权，以及病退、困退权的色狼们，以这些特权为诱饵，奸污了不少女知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丰满诱人，她拒绝了连长的调戏，便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来回一次，半个月后她屈服了，给了连长一个暗示。连长陪她看了一天水闸，第二天她就被调回连队驻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后一天，她少女的贞操与流水一同东去了。

本文没有使用强奸一词，一九七四年打击这些色狼时也没有使用强奸一词，因为绝大部份女知青被侮辱时，侮辱者确实没有使用暴力，他们使用的只是权力，人民给他们的权力。

悲剧在于人民的女儿正在被这些掌权者奸污！

#### ◇ 一个色狼在橡胶林中游荡

云南是个美丽的地方。大批知识青年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九六八年第一批北京知青是在周恩来亲自批准下进入到西双版纳地区的，而后又有上海、昆明两地知青离开家乡，来到漫长的边境线上，开垦荒山，种植橡胶树。

一九七零年云南农场在屯垦戍边的伟大指示下，成为昆明军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批现役军人进入到兵团，担任了由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

四川省成都、重庆两市的知识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志愿，经过严格政审，大批来到云南，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准军人。

然而，知青们不会想到，几年后周恩来总理又会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奸污女知青的材料后击案大骂：“这不是共产党，这是国民党！”

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容忍的。

上海女知青施某在连长的第一声哨子中便从睡梦中醒来，她以军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衬衣、蹬上长裤和蚂蝗套，戴上头灯，挎上胶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

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阴影遮挡着黎明，几个小时后阳光才会照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范围内的这个小山寨，或者叫做连队。一盏又一盏晃动的头灯说明又一个割胶日开始了。

头灯在通向橡胶林的道路汇拢了，曲曲弯弯，排成一长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萤火虫在飞舞。

渐渐地，灯火稀疏了，人们一个个钻进属于自己的林段，浓密的橡胶树叶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离连队驻地三里远的山坡上，她负责着几十亩山林的几百多株橡胶树的割胶和管理。

在她林段的起点，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无比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

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宏愿离开家乡，把青春

和汗水抛洒给红土高原的一草一木。

是的，这里很艰苦，有人跑回家乡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缅甸。但是，施某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识青年，尤其对女青年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轻微的响声，施某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她曾听说有一野猪一拱嘴就把一个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边肉。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也是一团光亮，说明有一个人戴着头灯。她看出来，是连长，他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

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

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和连长在山顶处的一小块空地上。连长一上山就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施某坐在他的身边。

施某驱赶了一下蚊子，又寻找着有无蚂蝗爬上来，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施某从未见到过的欲火。

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以至于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解开全部衬衣扣时，她才开始恍惚。

施某没有戴胸罩，由于西双版纳地区的炎热也由于施在生活上和贫下中农一样。

当连长看到随着衣襟敞开而弹射出来的雪团一样的白乳房和樱桃一般鲜嫩的乳头，他使用全力倾压下来，一只手熟练地揭开了施某的裤带，并把手伸进她双腿之间。

施某顿时吓呆了。她不知道连长要干什么，或者说由于意识到连长要干什么，而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连长飞快地脱下自己的衣裤，像猛兽吞食小动物一样疯狂地占有了施。

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几下，但那样无力，几乎是眼睁睁地忍受着第一次被男人侵入肉体时的痛苦和伤痛。完事之后，连长抚摸着她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

施某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她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会觉得人们将指责她在犯罪。

连长心满意足地站起来，收起了雨布，用树叶擦去留在上面的处女血痕和污物，哼着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

派他到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开始是牢骚满腹。但很快他便在这贫困的山林中发现了乐趣，这便是那些一个个青春年少的女知青们。女知青们，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她们比连长在军营附近见到过的那些农村姑娘确实白嫩、诱人。

连长像一只饿狼一样开始物色猎物并选择扑食方式。橡胶林中是最好的地点，那里僻静偏远，很难碰到别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女知青们都会有恐惧感。

第一个女知青在他的怀抱中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于是，他带上一块雨布，每天都和勤劳的胶工们一同走进山林之中，先从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个次之，再次之……

施某相貌平平，已经是他身下的第八个牺牲品了。

当连长被揭露出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在橡胶林中有十几个女知青在他的兽欲中失去了贞操。

#### ◇ 公审大会

在任何一张中国地图上，都可以找到河口县城，它和越南的老街市仅一河相隔，中间由一座铁桥连接。

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天，驻地在河口县城的云南建设兵团第十六团进入了空前的戒备状态。在方圆十九里地内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设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民兵和端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

一大早，数千建设兵团战士便在这种紧张气氛中集合起来，从各个连队出发，通过一个个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夹道持枪者，来到一个山坡下。这个山坡平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上面同样是一层层梯田，梯田上长着稀疏的实生橡胶树，山顶处有一块保护原生林，有着竹丛和荒草。

但现在他们回过头去，看到十几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的枪口以俯视状态对准山坡下。这些戒备都只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召开一个公审大会。

河口的知青们刚成为兵团战士就参加过一个公审大会，审判大瑶山上一个六十多岁的瑶族老头自封皇帝，结果是连他带十几个大臣一同枪毙！

在一条三面环山的口袋形山谷里，十几个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几名持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排成一排，平举自动步枪，在一声命令中，扣动扳机。大约每人都放空了枪中的子弹后，战士们跑步离开刑场，两个提手枪的公安人员走过去，对着未死的犯人补枪。

这次不同，被审判对象不同。

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唯一被允许开进公审大会会场的汽车出现在公路上。汽车停下来，在一排枪口中，车蓬窗被打开了，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

被审判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干部！在解放军威信和地位处于巅峰的年代中，在说解放军一句坏话就被扣上“毁我长城”的岁月里！

山脚下已经搭好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几个云南省军区的领导和军事法庭的负责人脸色铁青地坐在上面。

十几个将被审判者站在台上，低垂着头。

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

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

X X X，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副参谋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八人……

X X X，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六团保卫科长……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六人……

X X X，……连长，奸污女知青……

X X X，……政治指导员，奸污女知青……

还有一名现役军人连长，不但奸污四名上海女知青，还与一条小母牛有过性行为，被上山打猎的老头发现揭露出来，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场者无不哗然。

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将在军人劳改场中渡过他的残年。

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亲是云南省的一个地委副书记，没法给他一丝的袒护。又可怜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女将为他承担一生的耻辱。

而在审判会场上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奸污和凌辱的人看着这种场面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在这次大规模审判之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枪毙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了。

而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陕西省、山西省、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队知识青年的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上山下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

◇ 黑幕上裂开了一条缝

这一切，都是从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开始的。

在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之前，这里曾来过一个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慰问团。不过，四川省知青慰问团的规模比北京知青慰问团大十倍，因为四川知青比北京知青多十倍。而两个慰问团的本质区别却是：北京知青慰问团是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而四川知青慰问团是来探望子女和晚辈的。四川知青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

子女当然也就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某团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某团有个男知青，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开荒时多休息了一会儿，连长便让他在烈日下毒晒，一直到他中暑休克。

某团一对男女知青小李和小王，在中学时便青梅竹马，来插队后相亲相爱，这在当时当然属于犯忌之事，是没好好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典型。他们有一次在橡胶林中谈情说爱，热烈亲吻拥抱时，被几支手电筒光柱照住，当即被扒得一丝不挂，押回连队，站在空场前面，接受全连一百多人的批判。

还有个男知青，一个多月没有吃过肉，实在太饿了，到连里唯一一个鱼塘偷捕了两条鱼拿水煮煮，洒点盐，狼吞虎咽下去。谁想到第二天便被正申请入党的同伴告发。民兵排长派民兵捆起盗窃犯，用枪托和木棍打断了他的腿，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下水游泳。

还有……

捆绑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还有一些连长、营长每天只是打牌，吃喝玩乐，把并不多的猪，很少的鸡，屈指可数的鱼视为私有财产，想吃便吃，而知青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女知青们似乎很少诉苦，被捆绑吊打的大多是调皮的男孩子。她们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女儿眼中常常闪过一点悲伤和忧怨，但他们以为是女孩子想念家乡的一种表现。

有一个女知青躲躲闪闪地讲过自己住了一次医院，她是想说自己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倒不是想揭发奸污过她的那个人，只是想说明兵团对她照料得很好，连长亲自给她送过鸡汤。她还只有十七岁，她所受过的教育竟然使她还不懂人工流产是怎么回事！

四川知青慰问团的成员们为自己的子弟所遭受的境遇感到气愤，他们把收集到的材料集中起来，没有向兵团领导反映，而是交到了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的手中。

在四川知青慰问团离开云南后没几天，保山地区某团发生了一场大火。

那是一个晴朗的月夜，一个男知青躺在蚊帐里看书，夜深时，他起身到他住的茅草棚后面小便去，没有将放在蚊帐内的蜡烛吹灭。当他的房后胶林中小便后，转回身来时，不禁目瞪口呆。原来茅草棚内已经冒出明亮的火光。

这个连队的住房几乎全部是竹木结构，而房内的一切设施也都是易燃品，如蚊帐、衣物、竹椅、木桌等。

当大火吞没了第一间茅草棚后，整排茅草房就没救了。人们跑出房子，有经验的人知道房子已经保不住了，就全力把家具等日用品从火海中抢救出来。

这时，一个老工人不安地告诉连长：你看那排房子中间冒蓝火，不大对头。

连长根本没在意，转身又去搬自己的咸菜缸。又过了几分钟，那里蓝火越来越明显，肯定有动物油脂在燃烧，老工人又一次警告了连长。

连长这才叫了一些人，集中全力扑灭了那里的火，拨开了横七竖八的废墟。

所有的人都愕然了！

十个女知青紧紧搂作一团，全身紧缩着，暴露的后背和肢体完全都烧黑了。当用强力分开她们时，只有胸口部份还有些完好的皮肤。

她们为什么不跑出来？

现场分析，发现她们没跑出来的原因是晚上睡觉时用八号铅丝将门紧紧封住，而慌乱中无法顺利打开。那铅丝还绑在成炭状的门框上。

她们是怕有人进去！十个女孩子睡在一间房子里还怕有人进去，这个人是谁呢？

她们没有把自己的怕告诉慰问团的人，她们因此再没有机会告诉了。

但四川省慰问团的材料终将这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奸污案的黑幕撕开第一道裂缝。

#### ◇ 派工作组严惩大小色狼

新华社驻云南分社负责人杨某无法成眠了，他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着，屋内白雾蒙蒙。他那张大号写字台上放着四川省知青慰问团中几个省报记者汇集的知青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他听说过知青们在兵团所受待遇并不全像报纸上讲的一样，但也没想到会如此严重。

看看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那是可以直接与北京对话的专用电话，他可以马上拨通北京，将情况反映上去。

可是，当他仍下最后一个烟头时，还是决定自己亲自下到兵团去了解一下情况，也可能那些四川的记者由于听到的都是四川知青的一面之词呢？

第二天，他离开省城昆明，乘坐窄轨火车，向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进发。

火车在开远县停住了，需要在这里换轨更窄的火车。

驻在开远的第十四军军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这不仅仅因为杨某是十级干部，而军长只不过是十三级干部。关键是军长深知新华社分社负责人的重要地位。杨不但可以直接参加省常委会，而且可以把经过自己的观点筛过的材料直报政治局。

杨没有在开远逗留，很快转乘火车抵达四师师部所在地蒙自县城。

兵团四师宣传科长听说新华社分社负责人驾到，心中不由一惊，慌忙向一个师政委报告情况。可惜这位土包子政委不象十四军军长那样明了新华分社的重要性，居然随便摆摆手：这是你们宣传部门的事，按一般记者接待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科长可不敢怠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他连忙打电话给十四军第四十一师。四十一师大概已接到军长的吩咐，立刻让出唯一的一幢高干小楼，让杨某住了进去。

一个星期之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看到杨某在如何活动。结果，像来一样，他又默默地走了。

在昆明新华社分社内，杨紧张地整理了几天材料，然后由专人送至北京。

三天之后，此材料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桌上，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者的高度关注，迅速做出了反应。

这反应到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周兴耳旁时，他如闻雷轰，只听秘书递过来的电话耳机中说：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责令周兴同志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处理迫害知青问题，中央工作组随后就到！

中共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浩浩荡荡来到了四师第十八团时，四师的领导们才认识到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应该用什么方式接待。

一切都晚了。

#### ◇ 女知青的血泪控诉与日俱增

十六团某连的一个夜晚，干了二十年农垦的地方干部副连长和他的老婆在连指导员住的房间前后门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个女知青神情暗淡地低头走进屋去。很快，屋里的灯灭了。

副连长堵上前门，侧耳听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一个男人放肆的喘息和床棱子的有节奏的摇响，他使劲敲起了门。

约过了五分钟，灯亮门开了。副连长和他老婆冲进去，见床铺平整，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也整衣在身。副连长问他们熄灯干什么？指导员拿出一枚有萤光的纪念章，解释说：我们在看毛主席纪念章。

副连长老婆不愧是心细的女人，发现了床单上有些可疑之物。但指导员矢口否认，何况他一个单身汉的床单上有可疑物也很正常。

第二天，副连长竟被扣上了攻击解放军、毁我长城的帽子，去做检查了。

人们对色狼有了经验，当十六团团部又被地方干部观察到一件此类案件时，他们向团长做了汇报，要求团长亲自出面。

那是一个作战参谋，住在团部二楼的一间房子内，根据监视，一名昆明女知青进入他房间后，再也没有出来，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

团长无可奈何地上了楼，敲门让作战参谋去拿军事地图，要举行演习。作战参谋把钥匙从门上小窗内丢了出来，拒绝开门。

团长大怒：“今晚的演习要你指挥！”

作战参谋不得已开门出来，但立即锁上了门。

幸亏另有人有这房间的钥匙，迅速打开了门，结果在迭成长形的军用棉被后面，发现了哆哆嗦嗦，一直不敢动的女知青。她依然一丝不挂，使警卫排的小伙子们大饱了眼福。

几天之后，这个女知青被扣上了“腐蚀解放军，拉干部下水”的罪名接受大批判。

中央和云南省的工作组刚开始深入到兵团的各基层单位时，号召大家保卫上山下乡的胜利果实，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旗帜下大胆揭发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坏人。

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大都是长期在农垦系统的地方干部。他们处在远离闹市的深山老林之中，一贯一个人说了算，养成些恶霸作风，但他们打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无需揭发，有些人已主动检讨，向知青赔礼道歉。

于是，广泛设立的检举箱内塞进了一些别的内容的检举信。工作组的人打开这些检举信后，不由得产生了顾虑。这些检举信的内容是：女知青被干部利用职权奸污！

可攻击解放军就是“毁我长城”！何况强奸、奸污、通奸是有区别的。

在他们犹豫之时，更多的揭发信送到工作组人员的桌上，揭发的内容越来越详尽：

某团保卫科长吴某有一天单独审问一个偷窃地方商店的四川女知青，在审问过程中发现她还在县城旅馆与男朋友通奸。吴表示为了取得通奸的证据。要对女知青进行具体检查。他先解开她上衣和胸罩，仔细研究了乳房后，认为不明显，还需检查阴部。女知青只好被迫脱去裤子。她刚躺下，分开双腿，吴某便扑上去，占有了她。女知青想反抗，但吴威胁说：“不同意，我就以盗窃罪把你和你的同伙一块关起来，让你以后没脸见人。”

某团农业连指导员齐某，以党支部书记名义找一个四川女知青到打谷场去谈话，两个人，躺在稻草堆上，先是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慢慢地齐搂住了女知青。女知青很害怕，但又不敢得罪齐，因为她正在申请入团。

齐说自己身体非常难受，希望女知青给治疗一下。女知青便询问怎么治。齐说：“要把我难受的东西放进你体内呆一会就好了。”

这个刚刚十六岁的女知青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还帮助指导员将“那个东西”送进体内，自己则忍受着疼痛。她觉得帮指导员治好病是自己的光荣。

某团运输连长，长期霸占两个北京女知青，当其中一个怀孕后，为了不使人们发现，他先是一天数次与之发生关系，使其流产，不成功，他竟然趁她不备，用穿皮鞋的脚，猛踢她的后腰。这个女知青终于流产了，但也留下了后天性不育症。

一桩又一桩，揭发材料堆满了工作组的案头。

这是不容置疑的残害知识青年，奸污女知青比捆绑吊打男知青留下的身心伤害更为严重！

有人提出来女知青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反抗因而不能给那些干部定罪。但是，女知青们大多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这些干部利用职权威逼、引诱、要挟等手段而失身的，而且长期利用这些被告人失身后的忍辱心理状态，进行兽行发泄。这些行为在客观上是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是绝对违背妇女意志的。

一切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都可视为犯罪行为！

军人和干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触犯了法律理应判刑！

中共中央下达了打击残害知青份子的正式文件。

#### ◇ 色狼们一个个低头伏法

被周恩来骂为不是共产党的那个人正是本文第二节所描绘的色狼连长，他被列入第一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名单之中。他叫张国良。与他一同执行死刑的还有某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这个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的现役军人曾向全营知青宣布：“晚上八点以后谁也不准出来瞎逛，否则就是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他坐着全营唯一一辆北京吉普车，不分黑天白天，在全营各个连队乱串，看上漂亮女知青就利用职权搞到手。他在公路上开车，碰到教导员搭车却不停下。这个恶霸式的人物直到听见宣判他死刑的判决书，才明白革命资历和绿军装也救不了他了，不觉瘫倒在地。

而后，凡是被揭出了与女知青发生过关系的非知青人员，一律判刑或给予处份，这是在一个极端的年代所必然采取的极端方式。

定案方式也并不复杂，只要调查组看到揭发材料，到被奸污的女知青那里进行了解，女知青点头承认，男当事人便可以被拘捕了。

开始，还要对女知青进行妇科检查，后来传下来一条指示：对女知青进行妇科检查也是一种变相迫害。就把这条手续也省略了。

那个捉住指导员的副连长被平反了，而那位指导员因携带女知青越境逃亡缅甸被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

那个被女知青腐蚀了的作战参谋也在这场打击运动中旧事重提，判了一年徒刑了事。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共二百余名现役军人，先后判刑及处份的三十余人。

揭露出来的奸污女知青的手段之恶劣，也令人发指。

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一辈子有一块无法痊愈的伤痕。

这些账仅仅记在那些色狼身上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责任者吗？

日军占领南京时奸污了两万名妇女，成为震惊世界的惨案！

而数万女知青惨遭奸污，不应该让历史和人类记住这悲剧吗？

当时为了使那些已经被众人知道的被奸污过的女知青们不因屈辱而难以生活，上面又下了一道命令：可以让她们在全师范围内自由调动。但是，调动的结果也并不佳，因为凡是单位新来一个女知青，大家立刻就明白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无论是被奸污还是与人乱搞，吃亏的都是女知青！

那些由农村上大学、提干、入党的女知青们，不管她们如何清白，也会被人联想到是付出代价换来的，尤其比较漂亮的女知青。

其实贞操并不值钱，关键在于失去贞操时得到的是不是爱！

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五月号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 吴 放（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何 为（美 国） <cnd-info@cnd.org>  
余子坚（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ord@cnd.org>  
《CND》代总编： 温 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 ftp.cnd.org [149.159.2.6]：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

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 //www. cnd. 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